

# 中国共产党百年文艺政策与文化领导权建设

谭好哲 任晓菲

**摘要:**在百年来的文化工作实践中,中国共产党逐渐探索和建立起了从文艺政策入手领导和调控文艺工作、实现文化领导权的制度化管理方式和工作机制。立足于民族革命、社会建设、改革开放以及民族复兴四大阶段的时代语境,从夺取、建立、巩固、强化文化领导权的不同历史任务出发,中国共产党文艺政策的制定和实践探索经历了四个阶段:一是二十世纪二十至四十年代以争夺文化领导权、“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为主要历史任务的初始探索阶段,二是新中国成立后五六十年代以建立文化领导权、“建构社会主义文化制度”为主要历史任务的曲折发展阶段,三是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巩固文化领导权、“发展社会主义文化生产力”为主要历史任务的调整转型阶段,四是二十一世纪以来以强化文化领导权、“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为主要历史任务的深化完善阶段。四个阶段的文艺政策制定和具体实践各以其历史任务为规约和导引,高举党的思想旗帜,立足以人民为中心的导向,秉持中国本位的立场,为推动中国现代革命文艺和当代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繁荣发展、为实现党在整个中国社会的思想文化领导权提供了坚实的制度保障和掌控机制。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文艺政策;文化领导权;历史经验

**DOI:** 10.19836/j.cnki.37-1100/c.2021.06.001

回首百年来的中国历史,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理论自觉、思想引领的原则,将以意识形态为核心的文化领导权建设放在党的工作的突出地位。而文学艺术作为“意识形态的形式”<sup>①</sup>,具有反映时代生活、振奋民族精神、凝聚社会价值的精神力量,一直是中国共产党文化领导权建设的重要实践领域。在百年来的文化工作实践中,中国共产党逐渐探索和建立起了从文艺政策入手领导和调控文艺工作、实现文化领导权的制度化管理方式和工作机制。

从表现样态来看,除了党和政府制定并颁布实施的正式文件,文艺政策更多以党和国家领导人就文艺问题发表的论述、讲话和报告等形式呈现,并通过相关的文艺团体、学术机构、文艺刊物进行理论阐释和具体实践。而从具体的演进历程来看,立足于民族革命、社会建设、改革开放以及民族复兴四大阶段的时代语境,从夺取、建立、巩固、强化文化领导权的不同历史任务出发,中国共产党文艺政策的历史探索和建构经历了四个阶段:一是二十世纪二十至四十年代以争夺文化领导权、“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为主要历史任务的初始探索阶段,二是新中国成立后五六十年代以建立文化领导权、“建构社会主义文化制度”为主要历史任务的曲折发展阶段,三是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巩固文化领导权、“发展社会主义文化生产力”为主要历史任务的调整转型阶段,四是二十一世纪以来以强化文化领导权、“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为主要历史任务的深化完善阶段。四个阶段的文艺政策制定和具体实践各以其历史任务为规约和导引,高举党的思想旗帜,立足以人民为中心的导向,秉持中国本位的立场,为推动中国现代革命文艺和当代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繁荣发展、为实现党在整个中国社会的思想文化领导权提供了坚实的制度保障和掌控机制。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中国当代文艺价值观建设研究”(17JJD720011)。

**作者简介:**谭好哲,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济南 250100; thzh@sdu.edu.cn);任晓菲,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济南 250100; rxf1994@163.com)。

<sup>①</sup>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92页。

## 一、争夺文化领导权时期文艺政策的初始探索

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伴随着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中国现代历史由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入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新阶段。建党初期,党的早期领导人就将文化运动视为宣传革命主张、动员人民群众的重要途径,在文化战线争夺意识形态领导权随即成为党在此一时期的一项重要历史任务,并以之与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斗争相配合。正如毛泽东所言:“我们共产党人,多年以来,不但为中国的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而奋斗,而且为中国的文化革命而奋斗……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这就是我们在文化领域中的目的。”<sup>①</sup>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对于文艺政策的探索主要经历了如下三个阶段:

五四运动至大革命时期,是以文学论争为核心的早期理论探索阶段。1915年之后,陈独秀等接受新式教育的启蒙者开始倡导新文学,以文学革命开启了新文化运动的革命新浪潮。五四运动之后,受苏联十月革命的巨大影响,党的早期领导人李大钊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我的新文学观》等文章,较早地向国人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其中包含着文艺属于“观念的形态”<sup>②</sup>(即“意识形态”)这一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核心思想,推动了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文艺观念的转向。1924年,郭沫若提出“我们的文艺只能是革命的文艺”<sup>③</sup>的主张,发出了文学革命向“革命文学”转向的先声。此后,以创造社等文学社团为依托,文学界展开了声势浩大的“革命文学”运动并引发理论论争。李初梨、成仿吾等文艺理论家先后提出“文学,有它的组织机能,——一个阶级的武器”<sup>④</sup>和“由文艺的武器成为武器的文艺”<sup>⑤</sup>等主张,将革命文学的功能定位为服务于无产阶级革命的宣传工具或宣传手段,推动现代新文学进入“无产阶级文学”的发展阶段。受创造社部分理论家的影响,以鲁迅为代表的左翼文艺家开始自觉学习和建设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1928年6月起,鲁迅在《奔流》上陆续刊载《苏俄的文艺政策》的8篇译文,率先将“文艺政策”这一名词引入中国,这也成为其系统译介苏俄文艺理论的开始。1930年6月,该书经冯雪峰编校以《文艺政策》之名由上海水沫书店出版,对党的文艺政策建设产生了积极推动作用。

随着井冈山等革命根据地的建立,中国共产党形成了以“左联”和“苏区”为核心的两大文化阵地,正式开启了文化战线的建设工作,党的文艺政策进入局部实践阶段。1929年6月,在上海召开的中共六届二中全会上,党中央专门针对宣传工作制定了系统而详细的《宣传工作决议案》,要求通过建立文艺社团、编印出版物和组织群众集会等手段,“利用一切能引起群众注意的问题……在斗争中扩大宣传”<sup>⑥</sup>,并在中央宣传部统一领导下,建立包括文化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文委”)在内的体系完整的宣传组织和队伍,以保证党的宣传工作能够从上到下得以贯彻落实。该决议案标志着共产党人开始有意识、有目的地利用文艺开展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成为党的文艺政策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此后,党中央调停了“革命文学”的论争,于1930年在上海组织成立“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以及“社联”“剧联”等文化组织,建立起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鲁迅在“左联”成立大会上发表题为《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的重要讲话,指出“左联”的任务在于扩大文艺战线,发展新的革命战士,进行无产阶级文学斗争;“文委”党团书记潘汉年写了《左翼作家联盟的意义及其任务》,冯乃超先后写了《中国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及左联产生之历史的意义》《左联成立的意义和它的任务》;“左联”执

①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63页。

② 李大钊:《马克思的历史哲学》,《李大钊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年,第293页。

③ 郭沫若:《孤鸿(通信)》(1924年8月9日写于日本),《创造月刊》第1卷第2期,1926年4月16日。

④ 李初梨:《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丛书》(乙种)《文化批判》第2号,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28年,第9页。

⑤ 成仿吾:《全部的批判之必要——如何才能转换方向的考察》,《创造月刊》第1卷第10期,1928年3月1日。

⑥ 《宣传工作决议案》,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0年,第260页。

委会还通过了《无产阶级文学运动新的情势及我们的任务》等决议。这些讲话、文章和决议就文艺与革命实践、文艺与思想斗争、文艺服务对象、文艺大众化等理论问题的论述,对于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

这一阶段,党中央通过在“左联”内部设立党团进行具体领导,在国统区积极开展文艺领域的意识形态斗争,对国民党所发动的“民族主义文艺运动”以及以胡秋原、苏汶为代表的“自由人”“第三种人”的错误文艺观念进行了积极有力的批判和论争。而在苏维埃解放区,文艺建设作为党领导的苏维埃政权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部分,则是与其政治军事工作融为一体的。1929年,由毛泽东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即《古田会议决议》)是组织与推进苏区早期文艺工作的纲领性文件,由此形成的“宣传兵”军队文化管理制度和“俱乐部”群众文化组织制度成为苏区文艺体制建设中的“两架马车”。1933年之后,随着瞿秋白、张闻天等文艺理论家来到苏区负责党的文艺教育工作,苏区文艺进入系统化、体制化发展的新阶段。对于苏区文艺来说,其核心任务就是宣传党的政治主张,动员和团结广大的工农兵群体,巩固并扩大党在土地革命时期的文化领导权。作为党的主要领导人,张闻天在《文艺战线上的关门主义》一文中对左翼文艺在文艺创作和批评等方面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反思,提出要扩大并坚持以“化妆宣传”、活报剧、布告诗等最具群众性的民间文艺形式普及教育,使“左翼文艺运动变为广大的群众运动”<sup>①</sup>的主张,将文艺工作在政治上的方向性、策略上的务实性、形式上的通俗性有效结合起来,为延安时期文艺政策的体系化建设和文艺运动的大众化实践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抗日战争开始之后,中国共产党对文艺和文化工作的领导进入到以延安为核心的文艺政策体系化初创阶段。1935年10月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经过艰苦长征胜利到达陕北,1937年陕甘宁边区政府建立,中国革命根据地开启了以延安为中心的新时期。陕北根据地相对稳定的政治军事环境,为党的文艺和文化工作的开展提供了更好的现实条件。伴随着大批左翼知识分子奔赴延安,来自根据地和非根据地的两种革命文艺力量在延安汇合,建构起延安文艺的丰富样貌,也产生了加强文艺和文化运动领导的现实要求。这期间,中国文艺协会、边区文艺救亡协会、鲁迅艺术学院等文艺组织和机构先后成立,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朱德等党的主要领导人就文艺工作发表了许多重要讲话和文章,全面参与领导并推进延安文艺的建设。1939年5月17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中央关于宣传教育工作的指示》,明确提出:“估计到中国文化运动(文艺运动在内)在革命中的重要性,各级宣传部必须经常注意对于文化运动的领导,积极参加各方面的文化运动,争取对于各种文化工作团体机关的影响……在必要时,可吸收一部分文化工作的同志,在区党委、省委以上的宣传部下组织文化工作委员会”<sup>②</sup>。1941年9月30日,中央“文委”又发出关于组织文艺小组的通知。“文委”和文艺小组的成立,使得党对文艺协会和院团机构的领导和管理上下贯通起来,得到了制度和机制上的保证。除此之外,党中央还根据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现实对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性质和发展方向作出科学明确的论述。1940年1月9日,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所作《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讲演中指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sup>③</sup>。这一论断表明,中国共产党领导建设的新文化应具有自己的民族形式,通过对旧文化的批判继承,建设服务于人民大众的优秀文化,为新中国成立前的文艺工作确立了重要方向。这一阶段,围绕着文艺主体建设、文艺工作导向等问题,中央领导人和中央领导机构陆续发表、发布了《大量吸收知识分子》(毛泽东)、《抗战以来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运动与今后

① 哥特(张闻天):《文艺战线上的关门主义》,《中国新文学大系(1927-1937)》第1集《文艺理论集(一)》,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第450页。

② 艾克恩编纂:《延安文艺运动纪盛(1937.1-1948.3)》,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年,第136页。

③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08-709页。



任务》(张闻天)、《总政治部中央文委关于部队文艺工作的指示》《中央宣传部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关于各抗日根据地文化人与文化人团体的指示》《关于党的宣传鼓动工作提纲》(张闻天起草,中央宣传部发布)等政策性讲话、文章和指示,提出要团结并推动知识分子走近工农群众,做好文化的普及与提高工作,“全力扩大与巩固抗日文化统一战线”<sup>①</sup>,体现出党的主要领导人和党中央关于建设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政治规划与要求。

1942年,党中央发起大后方整风运动。针对延安文艺工作中存在着的一些错误认识和争论,毛泽东组织召开文艺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立足于“为什么人”和“如何为”两个核心问题,毛泽东明确了“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sup>②</sup>这一根本性立场,并围绕着文艺创作反映论、普及与提高的关系、文艺批评的标准等问题,提出了“革命的文艺,则是人民生活在革命作家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sup>③</sup>、“我们的提高,是在普及基础上的提高;我们的普及,是在提高指导下的普及”<sup>④</sup>、“以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以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sup>⑤</sup>等一系列重要论断和要求,为革命文艺的发展指出了新方向。1943年11月,中共中央刊发了《中央宣传部关于执行党的文艺政策的决定》,进一步落实讲话精神。这是党中央首次以“文艺政策”为名发布文件,标志着文艺政策体系化建设的进一步深化。

从新中国成立前党的文艺政策的建设情况可以看出,革命战争时期夺取文化领导权是党的一切文化工作的基本任务和根本目的。在党的统一领导下,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武装,在国统区的文艺工作者主要通过成立组织、进行文艺批判与论争、出版刊物等形式展开意识形态斗争,渗透和传播党的政治主张;在红色政权治理下的革命根据地,文艺工作者则充分利用秧歌剧、布告诗等民间文艺形式大规模开展宣传教育工作,扩大革命文艺统一战线。尤为重要的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作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科学与文艺政策的最好的课本”<sup>⑥</sup>,凝聚着五四运动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关于革命文艺建设的理论和实践探索的精神智慧,成为党在思想理论建设事业上的标志性成果,也作为一种“前结构”“前理解”规定了新中国成立之后文艺建设的根本方向。

## 二、确立文化领导权时期文艺政策的曲折发展

随着新中国的成立,中国革命由以武装斗争为主的时期进入到以生产建设为主的历史时期。与此同时,党的主要领导人开始思考新政权建立后文艺事业的发展路径,探索并建立社会主义文艺政策和文化制度,以确立由新民主主义制度向社会主义制度过渡下的文化领导权,保证党对于意识形态领域的全面领导。新中国成立之后到“文化大革命”结束,我党文艺政策的发展经历了前“十七年”和“文化大革命”十年动荡两个时期,而前“十七年”文艺政策的发展又主要包括三个阶段: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之前,以改造旧文艺为核心的政策初建阶段;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以“双百”方针为指引的曲折发展阶段;20世纪60年代上半叶,以纠正“左”的倾向为主的文艺政策调整阶段。

新中国成立前的1949年7月,中国共产党组织召开了第一次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以下简称“文代会”),意在将全国文化战线上的文艺工作者团结起来,贯彻和发扬《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核心精神,进一步确立人民民主专政下党对文化工作的领导权。在这次大会上,周恩

① 洛甫(张闻天):《抗战以来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运动与今后任务》,《延安文艺丛书》编委会编:《延安文艺丛书》第1卷《文艺理论卷》,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46页。

②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63页。

③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60页。

④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62页。

⑤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69页。

⑥ 周扬编:《马克思主义与文艺》,北京:作家出版社,1984年,第1页。

来代表党中央作了长篇政治报告,关于文艺工作主要讲了团结、为人民服务、普及与提高、改造旧文艺、树立全局观念、建立文艺组织这六个方面的问题<sup>①</sup>,为新中国文艺政策的制度化建设奠定了基础。此外,党的文艺工作的主要负责人郭沫若作了《为建设新中国的人民文艺而奋斗》的总报告,周扬和茅盾分别就解放区和国统区的革命文艺运动情况作了《新的人民的文艺》和《在反动派压迫下斗争和发展的革命文艺》的总结报告。这三个报告从多方面总结了五四运动以来党领导革命文艺工作的基本历程和主要成就,并以解放区文艺建设的实践经验,证明了以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引领新文艺发展的正确性和必要性,为文艺工作者指明了今后前进的方向。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逐步建立起以党的领导为核心、以政府的文艺部门与专业文艺群团联动并举的文艺体制。为了加强意识形态工作的建设,中共中央于1951年5月召开了新中国第一次宣传工作会议,刘少奇作了《党在宣传战线上的任务》总结报告,强调要丰富文艺创作和形式,“特别要增加适合于工农劳动群众的宣传教育工具”<sup>②</sup>,进一步开展改造旧文艺的整风工作。1953年,随着社会主义改造工作的全面展开,在全国第二次文代会上,时任文化部副部长的周扬作了《为创造更多的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而奋斗》的报告,提出“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方法作为我们整个文学艺术创作和批评的最高准则”<sup>③</sup>。对此,周恩来进一步指出,这一准则的本质就是将“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理想主义结合起来”,引导作家在把握正确方向的基础上,有目的地“深入实际生活”<sup>④</sup>,努力创作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优秀作品。与此同时,党和政府也开始了对文艺团体、文艺事业单位相关管理制度的改革,全面开启了社会主义文化制度体系的建设。

随着中共八大的召开及社会主义改造任务的基本完成,我国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为了进一步推动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发展,1956年4月28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正式提出了“双百”方针,即“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sup>⑤</sup>。“双百”方针要求,在维护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的根本前提下,提倡在文学艺术与科学研究中“有独立思考的自由,有辩论的自由,有创作和批评的自由”<sup>⑥</sup>,以营造学术民主、艺术民主的宽松和谐氛围。1957年2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作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重要讲话,进一步指出,对人民内部矛盾只能用“团结—批评—团结”<sup>⑦</sup>的民主方法去解决,而不能用强制的、压服的方法。“双百”方针的提出适时扭转了此前以知识分子改造为核心的意识形态工作的方向,为社会主义文艺发展带来了新的生机。此后一段时期内,《人民日报》《文艺报》《人民文学》等主流媒体还引导文艺界围绕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等文艺理论和美学问题展开深入的理论研讨。在文艺实践方面,这一时期展现现代革命斗争历程的《保卫延安》《红旗谱》《红日》《红岩》、书写知识分子成长历程的《青春之歌》、表现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运动的《创业史》等一批极具艺术价值的文学作品相继出版,新民歌运动如火如荼地展开,社会主义文艺一度呈现出活跃发展的新气象。

1961年,伴随着国民经济的调整 and 纠“左”工作的开展,党中央开始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文艺政策也随之进入整顿纠偏的调整阶段。同年6月,中宣部在北京组织召开全国文艺工作座谈会和全国电影故事片创作会议(即“新侨会议”)。会议期间,周恩来发表重要讲话,对文艺领

① 周恩来:《在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宣传处编:《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纪念文集》,北京:新华书店,1950年,第26-32页。

② 刘少奇:《党在宣传战线上的任务》,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266-267页。

③ 周扬:《为创造更多的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而奋斗》,《周扬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第249页。

④ 周恩来:《为总路线而奋斗的文艺工作者的任务》,《周恩来论文艺》,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第53页。

⑤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总结讲话》,《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54页。

⑥ 陆定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陆定一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501页。

⑦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10页。

域出现的“套框子、抓辫子、挖根子、戴帽子、打棍子”<sup>①</sup>等“左”倾现象进行了严肃批评,并就阶级斗争与统一战线、精神生产与物质生产、文艺规律与评价机制等问题作了论述,提出了精神生产不能限时间限数量,思想斗争和思想改造是长期任务,文艺为政治服务要通过形象表现,文艺领导不要过多干涉等主张<sup>②</sup>。在此基础上,会议讨论、制定了《关于当前文学艺术工作的意见(草案)》(即“文艺十条”),并下发各地征求意见。1962年3月,全国话剧、歌剧、儿童剧创作座谈会在广州召开,陈毅对文艺“大跃进”作了反思,并就文艺创作、文艺领导等问题作出指示。4月30日,中共中央批转文化部党组和全国文联党组《关于当前文学艺术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草案)》(即“文艺八条”),对文艺工作的不同方面和环节,从文艺制度到创作方法都予以明确规定。该《意见》强调:要贯彻执行“双百”方针;努力提高创作质量;批判地继承民族文化遗产和吸收外国文化;正确地开展文艺批评;培养优秀人才,奖励优秀创作;加强团结,继续改造;改进领导方法和领导作风<sup>③</sup>。这些意见和要求旨在推动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回到科学正确的轨道上来。60年代初的一系列政策调整,推动文艺创作再度进入活跃状态,包括文学、电影、戏剧、美术在内的诸多艺术门类都产生了大批反映革命征程和时代巨变的优秀作品,显示出“十七年”时期党中央领导文艺建设的重要成就。

总体而言,新中国成立之初“十七年”时期的文艺政策基本上沿袭了我党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政治优先的文艺观念和工作思路,又基于新的历史形势得到新的发展。从政策变革来看,“双百”方针是党立足于社会主义初建阶段的现实语境和历史任务所进行的科学的理论探索,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文艺实践相结合的重要产物,为社会主义文艺的发展开拓了广阔空间,成为党领导意识形态工作要始终坚持的长久之策。然而,不可否认的是,新中国成立之后的近30年间,我们党在领导文艺和文化工作中也走过一些弯路,犯过一些错误。这主要表现在现代革命进程中形成的政治挂帅、战时思维没有及时随着国家进入和平发展和建设时期而从根本上加以调整,“左”的乃至极左的思想和政策取向不时对文艺和文化工作的正常发展带来干扰甚至破坏性影响。其中最为突出的是1966年4月在江青主导下炮制出笼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以所谓的“文艺黑线专政论”和“黑八论”(包括“写真实论”“现实主义广阔道路论”“现实主义深化论”“反‘题材决定论’”“中间人物论”“反‘火药味论’”“时代精神汇合论”“离经叛道论”)全盘否定中国革命文艺的历史发展及其理论探索与创作成就,惯性延续了过去“左”的文艺路线,也奠定了“文化大革命”期间极左文艺路线的基础。“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动乱,打断了20世纪60年代初期文艺政策调整之后带来的良好文艺和文化工作局面,在极左政治思潮的裹挟下,中国文艺几近走进荒芜黯淡的死地,其中的历史教训颇堪反思与记取。

### 三、巩固文化领导权时期文艺政策的调整转型

随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顺利召开,中国社会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在这一时期,新民主主义时期以阶级斗争为主的战时社会形态以及社会主义初建时期时常伴有的大规模政治运动已经不复存在,中国社会进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谋求和平发展的阶段,社会主义文艺政策体系的建构也进入调整转型阶段。邓小平指出:“讲社会主义,首先就要使生产力发展,这是主要的。只有这样,才能表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sup>④</sup>这其中,“使生产力发展”也包括对于文化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从改革开放后20余年的历史进程来看,以“双百”方针和“二为”方向为基本纲领,文艺政策的发展主要包括

① 周恩来:《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周恩来论文艺》,第80页。

② 周恩来:《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周恩来论文艺》,第84-92页。

③ 《文化部党组和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党组关于当前文学艺术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草案)》,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5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308-319页。

④ 邓小平:《社会主义首先要发展生产力》,《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14页。



两个阶段:20世纪70年代末至90年代初,是以“思想战线的拨乱反正”为基本任务的整顿调整阶段;90年代,则是以“发展文化经济”为核心的转型发展阶段。两个阶段政策发展的共同目的,是在巩固党在意识形态领域领导权的前提下,恢复和焕发文艺与文化生产的活力。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思想解放为先导,开启了党和国家工作的新局面。邓小平在此前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作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批评了两个“凡是”的政策主张,倡导真正落实民主集中制,为党全面开展拨乱反正工作奠定了思想基础。在总结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的前提下,1979年10月,邓小平发表《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词》(以下简称《祝词》),正式吹响了改革开放新时期党领导社会主义文艺事业拨乱反正、转型发展的历史号角。《祝词》对于社会主义文艺的性质、任务、地位和作用等问题进行了整体论述。围绕着文艺与人民的关系问题,邓小平指出,“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文艺工作者要加强同人民之间的联系,“自觉地在人民的生活中汲取题材、主题、情节、语言、诗情和画意”<sup>①</sup>。围绕文艺与时代生活的关系,《祝词》强调文艺要通过生动感人的艺术形象反映时代生活的本质,表现社会前进的趋势,教育并激励广大人民群众,以助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推动文艺生产的丰富和创新。此外,《祝词》还着重谈到了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问题,强调指出:“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不是发号施令,不是要求文学艺术从属于临时的、具体的、直接的政治任务,而是根据文学艺术的特征和发展规律,帮助文艺工作者获得条件来不断繁荣文学艺术事业,提高文学艺术水平”<sup>②</sup>。因此,衙门作风必须抛弃,文艺批评领域的行政命令必须废止,对文艺家的具体创作活动不要横加干涉。这些论述重新审视了文艺的意识形态性和审美特性的关系,重新建立起对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科学理解,也对党在新形势下如何领导文艺作出了新的思考,为新时期党的文艺政策的整顿和历史转型奠定了基础。

就实际而言,新时期党的文艺政策的整顿和调整转型是以文艺与政治关系的重新定位为起始的。1980年1月,邓小平在《目前的形势和任务》中指出,在整个国家的政治局面上,“要安定团结,也要生动活泼”<sup>③</sup>。在文艺方面,虽然“文艺是不可能脱离政治的”,但是要“坚持‘双百’方针和‘三不主义’,不继续提文艺从属于政治这样的口号,因为这个口号容易成为对文艺横加干涉的理论根据,长期的实践证明它对文艺的发展利少害多”<sup>④</sup>。1980年7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社论,正式确立新时期文艺发展的“二为”方向。该表述一方面将革命战争时期以工农兵为绝对主体的“人民”的范围,拓展为“包括广大的工人、农民、士兵、知识分子、干部和一切拥护社会主义、热爱祖国的人们”这一更广大的范围,建立起社会主义爱国统一战线;另一方面,揭示出“为社会主义服务”就是“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事业服务”<sup>⑤</sup>的内涵。此后,“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作为党的基本文艺政策一直沿用至今,成为推动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的重要指南。与此同时,面对社会上出现的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思潮,1981年3月27日,邓小平在《关于反对错误思想倾向问题》的谈话中明确指出:“解放思想,也是既要反‘左’,又要反右”<sup>⑥</sup>,并以对电影剧本《苦恋》的批评为例,强调要在民主和法制的前提下掌握好文艺批评的武器。此后,在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的“整党”议题之下,邓小平又作了《党在组织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迫切任务》的重要讲话,再次强调“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sup>⑦</sup>,并深刻批评了文艺界存在的社会主义方向淡漠、精神产品商品化、资产阶级腐朽文化侵蚀等问题。邓小平还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大力加强党对思想战线的领导,积极开展文艺批评与自我批

① 邓小平:《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词》,《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11-212页。

② 邓小平:《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词》,《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13页。

③ 邓小平:《目前的形势和任务》,《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51页。

④ 邓小平:《目前的形势和任务》,《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55-256页。

⑤ 《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人民日报》1980年7月26日,第1版。

⑥ 邓小平:《关于反对错误思想倾向问题》,《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79页。

⑦ 邓小平:《党在组织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迫切任务》,《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9页。

评,提高文艺工作者的党性修养,切实发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在一切重大理论性、原则性问题上的指导作用,稳步推进新时期文艺政策的转型和发展。

新时期开始之后,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一直在探索“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马克思主义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1987年,党的十三大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在此种历史语境下,文艺与经济的关系成为影响1990年代以来文艺和文化政策转型的重要因素。党的十四大以来,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继续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在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中进一步丰富和完善党的文艺政策。1991年,国务院批转《文化部关于文化事业若干经济政策意见的报告》,正式提出了“文化经济”概念。1992年,江泽民在十四大报告中提出要“积极推进文化体制改革,完善文化事业的有关经济政策,繁荣社会主义文化”<sup>①</sup>。作为上层建筑领域内意识形态生产的一个部门,文艺生产被纳入社会商品生产的运转体系之中,具有了精神价值和经济价值的双重属性。1994年,江泽民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进一步要求“在宣传文化工作中要始终把社会效益作为最高准则,当经济效益同社会效益发生矛盾时,自觉服从社会效益”<sup>②</sup>,为市场经济条件下文艺事业的健康发展确立了思想基础。1996年10月,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将“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sup>③</sup>与“双百”方针和“二为”方向并提,作为这一时期文艺工作的主导思想。1997年9月,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江泽民围绕着“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以及“如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两大问题作了深刻阐述,明确指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为目标,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sup>④</sup>。2001年12月,江泽民在中国文联第七次、中国作协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进一步强调广大文艺工作者“应该遵循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自觉投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努力推进我国文艺的创新和繁荣”<sup>⑤</sup>。这些论述和论断为我们党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人民发展社会主义文艺指明了方向。

综上所述,改革开放新时期的20余年间,党的文艺政策围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核心任务,重新定位文艺与社会发展的关系,重视文艺自身规律,重申“双百”方针和“二为”方向的政策导向,在调整和转型中有效满足了新时代条件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文化建设需求,进一步巩固了党在和平发展时期的文化领导权,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推动社会主义文艺事业迎来新的发展高峰。从政策变革来看,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牢牢把握意识形态工作的正确方向,稳步推动文艺政策的调整和完善,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提供了根本思想保障。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深化文化体制改革,进一步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推动文艺政策的全面转型,为新世纪以来社会主义文艺和文化的繁荣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① 江泽民:《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江泽民文选》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38页。

② 江泽民:《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人民日报》1994年3月7日,第3版。

③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144页。

④ 江泽民:《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江泽民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7-18页。

⑤ 江泽民:《在中国文联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01年12月19日,第4版。



#### 四、强化文化领导权时期文艺政策的深化完善

进入 21 世纪以来,全球化趋势日益加剧,文化软实力开始成为现代国家参与国际竞争的核心竞争力。而随着中国社会进入全面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阶段,在增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硬实力”的同时,党中央也愈加重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软实力”的提升,着力建立并完善现代文化治理体系。立足于新的历史基点,习近平指出:“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sup>①</sup>。这一战略目标的实施,已经历了两个阶段:十八大之前,是以“建设和谐文化”为核心的稳定建构阶段;十八大以来,是以“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为核心的创新发展阶段。伴随着这两个阶段的交替,党的文艺政策也经历着逐渐深化完善的发展过程。

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的重大战略思想,并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为这一阶段的执政目标。2005 年 12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发布,立足于“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的基本纲领,将“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三贴近”原则作为宣传文化工作的新要求,并倡导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文化市场体系”<sup>②</sup>。2006 年 11 月,胡锦涛在中国文联和中国作协的全国代表大会上明确提出“繁荣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和谐文化”<sup>③</sup>这一文艺发展新任务,并对文艺管理体制改革提出了新要求。此外,这一时期随着互联网媒介的快速发展,网络文艺成为中国当代文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成为意识形态治理的重要场域。对此,胡锦涛作了《加强网络文化建设和管理》的专门讲话,指出要“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唱响网上思想文化主旋律……提高网络文化产品和服务供给能力……推动我国优秀文化产品的数字化、网络化”<sup>④</sup>,强调在发挥网络媒介优势的同时,要牢固掌握网络文化建设和管理的领导权。

2011 年 10 月,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进一步发展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背景下的文艺政策。该决定主要包括以下主要内容:一是将对优秀文艺作品的评价标准调整为“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相统一”,鼓励一切有利于“陶冶情操、愉悦身心、寓教于乐”的文艺创作;二是提出建立和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通过兴办实体、资助项目、赞助活动、提供设施等形式,以保障人民群众的基本文化权益;三是立足于文化经济的发展战略,将文化产业进一步升级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sup>⑤</sup>,大力构建结构合理、门类齐全的现代文化产业体系,建立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文化产业格局。这一系列的重要举措进一步推动了新世纪以来的文化经济体制变革和文化管理体制创新。

党的十八大以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成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根本指向。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全局出发,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文化建设尤其是文艺事业在意识形态工作中的重要地位,将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作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路径。习近平先后发表了《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2014 年 10 月 15 日)

①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年,第 41 页。

②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年,第 127-129 页。

③ 胡锦涛:《在中国文联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年,第 5 页。

④ 胡锦涛:《加强网络文化建设和管理》,《胡锦涛文选》第 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年,第 560 页。

⑤ 《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 年,第 569-573 页。

和《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2016年11月30日),党中央下发了《中共中央关于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意见》(2015年10月3日),中央宣传部等五部门又于2021年8月联合印发了《关于加强新时代文艺评论工作的指导意见》,这些重要讲话和政策文件围绕文艺的创作导向、文艺的时代特性、文艺的精神根基以及构建中国特色文艺评论话语等根本性、方向性重大问题作出了创造性的理论论述和工作部署,建构起新时代文艺政策的话语体系,为繁荣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提供了理论纲领和行动指南。

面对市场经济环境下文艺发展领域存在的过度追求商业利益、盲目追逐西方思潮、传播不当价值观等不良现象,习近平在文艺工作系列讲话中强调文艺要为人民服务,文艺要为时代发声,文艺要弘扬中国精神。他主要突出了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文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把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作为文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习近平指出:“社会主义文艺,从本质上讲,就是人民的文艺。”<sup>①</sup>这是由人民群众的历史地位和社会主义的社会性质所决定的。文艺创作要以为人民服务为根本宗旨,把人民作为文艺表现的主体和文艺审美的评判者。在遵循集合性“人民”概念的基础上,习近平在讲话中进一步阐发了“人民”的个体意义,强调指出:“人民不是抽象的符号,而是一个一个具体的人”<sup>②</sup>。该论断高扬了人的历史主体价值,赋予了文艺书写人民生活的鲜活性和丰富性。同时,习近平还对党性和人民性的辩证关系进行了深刻阐释。他指出:“党性和人民性从来都是一致的、统一的……从本质上说,坚持党性就是坚持人民性,坚持人民性就是坚持党性,党性寓于人民性之中。”<sup>③</sup>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要始终坚持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把体现党的主张和反映人民心声有机统一起来。只有把握好这个立足点,才能正确认识并处理文艺的政治功用和创作自由的关系,不断创造出讴歌党、讴歌祖国、讴歌人民的精品力作。

其次,文艺要引领时代风气,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魂聚力。习近平指出,文艺创作要在与时俱进中“发时代之先声、开社会之先风、启智慧之先河”<sup>④</sup>,深刻地提炼和表达现实的重要命题,将文艺创作同国家和民族命运紧紧牵系起来。他又指出,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发展需要以核心价值观为自己提供精神凝聚力,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代中国精神的集中体现,凝结着全体人民共同的价值追求”<sup>⑤</sup>。作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核心要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维系中华民族繁荣发展的精神纽带,在推动思想道德建设、创建社会精神文明、增强民族文化认同等方面具有显著作用。对此,习近平号召广大文艺工作者“要把爱国主义作为文艺创作的主旋律,引导人民树立和坚持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sup>⑥</sup>,以文艺凝聚精神力量、坚定文化自信、铸就梦想工程,不断创作属于这个时代、具有鲜明中国风格的优秀作品,给人民以审美的享受和思想的启迪,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提供精神滋养和思想动力。

再次,文艺要传承民族精神和文化基因,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高度重视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寻找民族复兴的精神伟力,汲取治国理政的有益启示,以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话语体系。习近平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

① 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13页。

② 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第17页。

③ 习近平:《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23页。

④ 习近平:《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7页。

⑤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第42页。

⑥ 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第24页。

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sup>①</sup>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也是中国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在新时代的历史语境下,既要重视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守护和传承,也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以时代精神融会传统资源,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同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从而“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sup>②</sup>。

总结 21 世纪以来的文艺政策发展历程,可以说,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致力于发展和完善现代文化市场体系,推动文化治理体制的变革和创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的繁荣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则将文艺事业提升到治国理政的战略高度,将文化复兴纳入到民族复兴的战略全局中来,这是改革开放以来前所未有的。习近平关于文艺工作的系列重要讲话,对开创社会主义文艺工作新局面作出了全面部署,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话语体系,有效强化了党在新时代的文化领导权建设,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也为中西文化间的交流互鉴提供了中国方案。

## 五、中国共产党百年文艺政策建构与实践的历史经验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即将赢得胜利的 1948 年 3 月,毛泽东曾经针对当时党的各项工作中右的和“左”的倾向而主要是“左”的倾向严肃警告说:“只有党的政策和策略全部走上正轨,中国革命才有胜利的可能。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sup>③</sup>。可以说,中国共产党在此前和此后包括文艺在内的各项工作中,一直都是十分重视政策和策略问题的。在百年来的发展进程中,我们党在文化工作的指导方针和文艺政策的制定上尽管也曾走过弯路、有过失误,如上述第一个阶段中一度存在过的“左”倾关门主义、过分强调政治优位甚至以政治宣传代替艺术创新,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间不时存在着的“左”的思想倾向和文艺决策,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时期文艺观念和文艺政策趋于极左的极端发展等等,但总体而言,党的文艺政策的制定和发展是伴随着党和国家革命与建设事业的发展一步步走向成熟、科学和完善的。即使是那些弯路和失误,在后来以至今天,也成为我们党吸取教训的历史资源。回首百年来党的文艺政策演进之路可以看出,我们党对文艺和文化工作的领导基本上遵循和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所强调的“经权达变、与时偕行”的理念。从理论逻辑来看,文艺政策的制定是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社会主义文艺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历史实践在文艺和文化工作中的具体体现。作为这样一种理论逻辑的产物,中国共产党文艺政策的制定与文化领导权建设既具有一脉相承的历史性规律,又结合着不同时期的发展主题而变化,历史地书写出了中国百年文艺发展的思想图谱,积淀下丰厚的历史记忆和经验,为我们党今后发展文艺事业、领导文艺工作、制定文艺政策提供了极为有益的文化资源和历史借鉴。在这其中,以下三个方面值得特别重视:

一是文艺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必须高举思想旗帜,坚持党对文艺的领导。正如习近平所强调的,“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文艺发展的根本保证”<sup>④</sup>。从建党初始,中国共产党就深刻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唯一指导原理”<sup>⑤</sup>,由此逐渐探索并树立了以文艺意识形态理论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将其作为党领导文艺工作的思想指南,为中国革命文艺发展奠定了科学的理论基础。延

① 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第 25 页。

②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第 23 页。

③ 毛泽东:《关于情况的通报》,《毛泽东选集》第 4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年,第 1298 页。

④ 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第 27 页。

⑤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马克思诞生百零五周年纪念日敬告中国青年》,《先驱》第 17 号,1923 年 5 月 10 日。



安时期,围绕着民族解放的历史使命,毛泽东提出了“文艺服从于政治”的战时文艺发展方略,以建立最广大的革命文艺统一战线。新中国建立之后,为进一步发展民族新文化、建立社会主义文艺制度,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又创造性地提出了“双百”方针,使“十七年”时期涌现出不少思想性和艺术性俱佳的文艺作品。新时期之初,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通过全面拨乱反正,确立了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二为”方向,推动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文艺理论和创作的快速发展,极大地解放了社会主义文艺的生产力。21世纪尤其是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出发,科学分析了文艺领域面临的“新形势、新情况、新问题”,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文艺建设的“新思想、新判断、新要求”<sup>①</sup>,引导广大文艺工作者不断创造文艺精品,以满足人民对于美好生活的精神文化需求。可以说,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文艺始终保持先进方向的重要前提,推动着文艺政策不断发展和完善。

二是文艺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必须立足于人民需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导向。文艺的人民性问题始终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核心问题之一。从文艺政策发展来看,我们党的历届领导人都将“文艺为人民服务”作为文艺工作的根本追求。毛泽东在延安时期提出了文艺为广大的人民大众、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的主张,使工农兵从此成为中国革命文艺创作的表现主体和接受主体。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进一步提出“我们的文艺属于人民”<sup>②</sup>的论断,坚定引领着新时期以来社会主义文艺的发展方向。此后,江泽民和胡锦涛也一再强调,广大文艺工作者应当“虚心向人民群众学习,向生活学习”<sup>③</sup>,“一切进步文艺,都源于人民、为了人民、属于人民”<sup>④</sup>。新时代以来,习近平在丰富和深化“人民性”内涵的基础上,进一步从人民需要文艺、文艺需要人民、文艺要热爱人民三个方面系统论述和阐发了文艺与人民关系的逻辑理路和价值旨归,强调优秀的文艺作品要“为人民抒写、为人民抒情、为人民抒怀”<sup>⑤</sup>。党关于文艺人民性的更高要求和重新定位,为社会主义文艺在新时代的创新性发展指明了方向。

三是文艺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必须紧扣时代脉搏,坚守中国本位的立场。党在领导文艺建设的实践过程中,始终坚持走中国化的发展道路。1938年,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首次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命题,在文艺领域则表现为对洋八股、教条主义文风的整顿,“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sup>⑥</sup>。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早期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先后发起和引领了关于“文艺大众化”“民族形式”等问题的讨论和实践。1964年,毛泽东进一步提出“古为今用,洋为中用”<sup>⑦</sup>的方针,成为我国正确处理中外文化遗产、坚持民族化道路的长久之策。改革开放之后,广大的文艺工作者打破思想束缚,以开放自信的姿态不断书写中国发展的新成就。进入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新时代中国社会发展为现实根基、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精神基因、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思想底色,强调广大文艺工作者要讲好中国故事、弘扬中国精神、传播中国声音、展现中国面貌,体现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发展的内在定力与文化自信。

总之,百年来的历史发展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成功所取得的一个又一个伟大胜利,与正确的政策和策略分不开,而党在领导文艺工作、发展文化事业中所取得的一切成就和进步,也是因为有其正确的政策和策略。作为党领导文艺工作、发展和繁荣文化事业的方针大

① 中共中央宣传部编:《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学习读本·前言》,北京:学习出版社,2015年。

② 邓小平:《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词》,《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09页。

③ 江泽民:《在中国文联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01年12月19日,第4版。

④ 胡锦涛:《在中国文联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第8页。

⑤ 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第16页。

⑥ 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34页。

⑦ 毛泽东:《致陆定一》,《毛泽东书信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598页。

计,文艺政策是党的治国理政理念和文艺思想在文艺战线中的具体反映,深刻影响着文艺实践活动和批评理论研究的开展和创新,关系着党对于国家意识形态的建构以及文化领导权的掌控,从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对我们党从文化自觉到文化自信提供了有力的政策支撑。因此,以上三个方面的历史经验应该给予特别的重视,其中蕴含了我们党以政策手段领导文艺、发展文化、治国理政的思想智慧,这些经验和智慧不仅属于过去,对当下和未来也有其现实指导意义。新时代的中国正处于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的交会节点和关键时期,正确的文艺和文化政策以及发展策略,依然应该是我们党和政府发展文艺和文化的基本入手方式和工作机制,而党的领导、以人民为中心的导向、中国本位的立场则是党和国家的文艺政策始终保持正确性的根本保证。只有正确的文艺和文化政策,才能对新时代中国文艺和文化事业的发展发挥强大的指导和引领作用,从而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向着高峰迈进,推动中国文化走向伟大复兴的征程。

---

### The Centennial Literature and Art Policy and the Cultural Leadership Construction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an Haozhe Ren Xiaofei

(The Center for Literary Theory and Aesthetics, 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 250100, P.R.China)

**Abstract:** In the practice of cultural work in the past hundred years,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PC) has gradually explored and found an institutionalized management mode and working mechanism that starts with literary policies to lead and regulate literary and artistic work and realize cultural leadership. Based on the four stages of national revolution, social construction, reform and opening up, and national rejuvenation, starting from the different historical tasks of seizing, establishing, consolidating and strengthening cultural leadership, the formulation and practical exploration of the CPC's literature and art policy has gone through four stages. The first stage is the initial exploration stage with the main historical tasks of competing for cultural leadership and "establishing a new culture of the Chinese nation" from the 1920s to 1940s. The second is the tortuous development stage in the 1950s and 1960s after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in which the main historical task was to establish cultural leadership and "constructing a socialist cultural system". The third is the adjustment and transformation stage in 1980s and 1990s with the main historical tasks of consolidating cultural leadership and "developing socialist cultural productive forces". The fourth was the deepening and improving stage in which the main historical task was to strengthen cultural leadership and "build a socialist cultural power" since the new era. The formulation and practice of literature and art policies in the four stages are regulated and guided by their historical tasks, holding high the Party's ideological banner, based on the people-centered orientation and adhering to the Chinese standpoint, which provides a solid institutional guarantee and control mechanism for promoting the prosperity and development of modern Chinese revolutionary literature, art and contemporary socialist literature and art, and realizing the Party's ideological and cultural leadership in the entire Chinese society.

**Keywords:**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Literature and art policy; Cultural leadership; Historical experience

[责任编辑:以沫]